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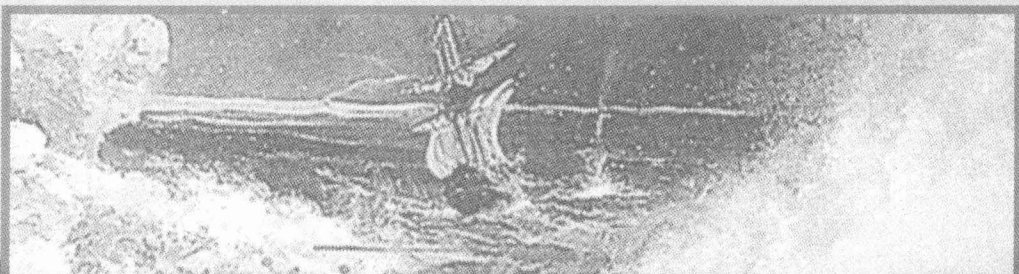


现代中外文学比较教程

谭桂林 主编

XIANDAI
ZHONGWAI WENXUE
BIJIAO
JIAOCHENG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现代中外文学比较教程



谭桂林 主编

XIANDAI
ZHONGWAI WENXUE
BIJIAO
JIAOCHENG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中外文学比较教程 / 谭桂林主编.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 - 7 - 5648 - 0021 - 5

I. 现… II. 谭… III. 现代文学: 比较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外国—教材 IV. I0 - 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7584 号

现代中外文学比较教程

◇主 编: 谭桂林

◇责任编辑: 谭南冬

◇责任校对: 蒋旭东 胡晓军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8853867 8872751 传真/0731. 8872636

网址/http: //press. hunnu. edu. cn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邵阳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7

◇字数: 620 千字

◇版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648 - 0021 - 5

◇定价: 42. 80 元



目 录

绪论 比较文学视域中的中国现代文学	(1)
第一节 现代中外文学交流的发生及其历史轨迹	(1)
第二节 现代中外文学交流实践的基本特征	(4)
第三节 外国文学参照下的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7)
第四节 本教程的目的、体例与编写	(9)
第一章 易卜生与中国现代文学	(11)
第一节 易卜生在中国的翻译介绍	(12)
第二节 易卜生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影响	(16)
第三节 易卜生对中国现代小说、诗歌的影响	(25)
第二章 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	(32)
第一节 鲁迅与尼采	(33)
第二节 创造社与尼采	(42)
第三节 战国策派与尼采	(52)
第三章 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	(65)
第一节 泰戈尔对中国的深厚感情	(66)
第二节 泰戈尔的中国之行及其影响	(68)
第三节 泰戈尔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74)
第四节 泰戈尔与中国现代重要作家	(79)
第四章 波德莱尔与中国现代文学	(88)
第一节 波德莱尔在现代中国的译介	(88)
第二节 波德莱尔的诗学观对中国现代诗学的影响	(91)
第三节 波德莱尔对中国现代诗人的影响	(99)
第五章 厨川白村与中国现代文学	(111)
第一节 厨川白村在现代中国的译介	(111)
第二节 厨川白村对中国现代文艺发展观的影响	(115)
第三节 厨川白村对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影响	(125)
第六章 惠特曼与中国现代文学	(135)
第一节 惠特曼在中国的译介与现代诗界对惠特曼的接受	(135)
第二节 惠特曼诗歌的炽热的诗情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150)



第三节 惠特曼诗歌中海的意象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162)
第七章 普希金与中国现代文学	(175)
第一节 中国对普希金的接受	(176)
第二节 普希金对建国前中国新诗的影响	(186)
第三节 建国后普希金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193)
第八章 契诃夫与中国现代文学	(201)
第一节 中国语境下的契诃夫传播	(201)
第二节 契诃夫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平民文学”	(213)
第三节 契诃夫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客观写实”	(218)
第四节 契诃夫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幽默讽刺	(223)
第九章 庞德与中国现代文学	(229)
第一节 庞德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	(229)
第二节 庞德诗歌题材内容与中国现代诗歌	(238)
第三节 庞德诗歌的形式与中国现代诗歌	(243)
第四节 庞德精神与中国现代诗人	(252)
第十章 克罗齐与中国现代批评家朱光潜	(254)
第一节 朱光潜对克罗齐美学的初步介绍	(254)
第二节 朱光潜对克罗齐美学的误读与批评	(260)
第三节 朱光潜对克罗齐美学的创造性应用	(263)
第四节 朱光潜对克罗齐美学的翻译述论	(271)
第十一章 里尔克与中国现代文学	(278)
第一节 里尔克及其存在主义诗学	(279)
第二节 里尔克与冯至	(283)
第三节 里尔克与九叶诗人	(296)
第十二章 艾略特与中国现代文学	(300)
第一节 艾略特在现代中国的传播	(300)
第二节 艾略特对中国现代诗学的启示	(309)
第三节 艾略特对中国现代诗歌创作的影响	(314)
第十三章 奥登与中国现代文学	(322)
第一节 奥登在中国	(324)
第二节 奥登与中国现代主义诗人	(333)
第三节 “奥登风”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	(337)
第十四章 马尔克斯与中国现代文学	(346)
第一节 传播与接受：从热忱、认同到深化、疏离	(346)
第二节 魔幻写作：从形似到“离形得似”	(351)
第三节 家族史叙述：从民族命运的观照到生存本体的言说	(356)
第四节 民族身份想象：从民族文化到民间精神	(360)



第十五章 川端康成与中国现代文学	(364)
第一节 川端康成与中国现代“新感觉派”	(364)
第二节 川端康成与现代中国的京派文人	(368)
第三节 川端康成与新时期中国文学	(384)
第十六章 大江健三郎与史铁生	(393)
第一节 洞察人类的广义残疾	(394)
第二节 再现困境背后的哲学思考	(403)
第三节 宗教精神中再寻拯救	(412)
后记	(423)



绪论 比较文学视域中的中国现代文学

第一节 现代中外文学交流的发生及其历史轨迹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历史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这一转折的主要标志是一向以老大帝国自居的中国在自身之外突然看到了一个强大的、无法回避的西方。对于中国国民而言，与西方的相遇完全是突如其来的、不期而至的。中国的国民几乎是在睡眠惺忪中突然遭遇到了西方这个庞然大物的碰撞。因而在19世纪后半叶，中国的知识者阶层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开始了对西方的认知。如果说魏源的《海国图志》是知识者从地理意义上对西方认知的尝试，郭嵩焘的出使日记是知识者从风物意义上对西方进行认知的尝试，那么，后来的洋务派的“师夷长技”、戊戌变法中的立宪维新等，就是中国的知识者深入认知乃至实践西方科技文明、制度文明的努力。到了20世纪，由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加大了步伐，与西方的接触、对西方的认知开始全面铺开。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尚文传统，文学在知识者的心目中乃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所以，认知西方的文学，也就自然成了中国知识者认知西方、学习西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梁启超可以说是20世纪第一位尝试学习外国文学来改造中国文学的知识者。他在变法失败以后，深感中国国民精神之萎靡不利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由是创办《新民报》、《清议报》等开始了他新民启蒙运动。梁启超清醒地认识到了文学尤其是直接被普通的下层民众所喜爱的通俗小说在塑造国民性格中的重要作用，也看到了通俗小说对于国民性格中的“奴颜婢膝”，“轻薄无行”，“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慕科第若膻，趋爵禄若鹜”等恶习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因而大声疾呼：欲新一国之民，欲新一国之道德、之风俗，乃至欲新一国之政治、之宗教，必先新一国之小说。如何才能新一国之小说呢？翻译西方的小说进来以作借鉴乃是梁启超的一个重要的选项。1898年，梁启超在《清议报》的创刊号上就开始登载西方的政治小说，并作《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阐述了自己的想法。他指出：“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膏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



正是因为充分意识到了政治小说在国民启蒙方面的重大作用,1902年梁启超在呼吁小说界革命的同时,自己身体力行写作了《新中国未来记》等政治小说,用小说的形式进行启蒙,鼓吹他的立宪改良主张。这种政治小说的形式是从西方文学中借鉴而来的,它的流行寓示着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最原初的关系就是从文学启蒙的政治功利性开始的。而中国现代文学对外国文学的大量引进也在这种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的群体心理中鸣锣开场。从戊戌变法到1917年新文学革命开始这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文学界终于迈出了译介外国小说的第一步。

在这个初始阶段里,有两种类型的翻译活动是值得一提的。一是林纾的翻译。林纾是晚清古文家、桐城派的主要骨干之一。他并不懂西文,他的翻译活动程序是先由一位懂西文的朋友将小说的大意口述出来,然后再由他用文字译出。过去有些研究者将此当作现代翻译史上的一桩笑话,其实这是忽略了林译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的开创意义。第一,林译规模宏大,十数年间他翻译出版的西方小说多达一百余种、一千余万字。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有规模就自然会有效应,就会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第二,林纾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将自己的古文功底用于翻译,使得他的译笔哀感顽艳,典丽雅致,具有强烈而浓郁的文学色彩。与林纾同时代的一些翻译作品之所以没有产生林译这么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译者在文学修养和文字功底方面远逊林纾,林纾正是以其母语的长人之处使自己的翻译成为中国现代翻译史上最早的品牌。第三,在翻译的选题上,林译宽泛而良莠不齐,有不少随意之选,但总体来看其中也包含了许多19世纪西方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如小仲马的《茶花女》、雨果的《悲惨世界》等,这些作品里所包含的人本主义思想和对劳苦大众的深厚同情,都深深影响了那个时代的青年读者,许多青年都是因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并且引起了对外国文学的兴趣。周作人就说林纾是影响鲁迅的第三个人。^①林纾后来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反对者和复古派的代表人物,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进行辩论,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文学观念确实十分保守,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林纾在无意之中开了那个时代翻译外国文学的新风,他有这个资格和实力来同年轻的新进理论家论战。

另一种类型的翻译以周氏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为代表。鲁迅1902年赴日本留学,1906年在东京弃医从文,欲创办杂志,发为新声,从事国民启蒙运动。这一时期鲁迅除写论文陈述自己的启蒙主张之外,还同周作人一起翻译了不少外国小说,1909年在东京结集出版,名为《域外小说集》。据资料记载,此书出版后只销售200余部,其社会影响肯定不能与林译相比,但其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的意义却是很重要的。首先,此书“收录至审慎”,所选作品“以近世小品为多,后当渐及十九世纪以前名作。又以近世文潮,北欧最盛,故采译自有偏至”。也就是说译者在翻译作品上有着很明确的选择性。其次,相对于林纾的意译而言,《域外小说集》“逐译亦期弗失文情”,是十分重视对原著的忠实的,也就是鲁迅后来提出的信、达、雅三原则中的信。不仅“弗失文

^① 鲁迅与郭沫若等都曾经读过林译小说,并为之兴奋不已。周作人回忆说:“我们对于林译小说有那么的热情,只要他印出一部,来到东京,便一定跑到神田中国书林,去把它买来,看过之后鲁迅还拿到订书店去,改装硬纸版书面,背脊用的是青灰洋布。”



情”，而且“人地名悉如原音，不加省节”，因为“音译本以代殊域之言，留其同响；任情删易，即为不诚”。当时林纾的翻译虽然盛极一时，但林纾本来是二次翻译，准确度已经存在问题，而林纾也以大家自居，对所译作品不仅删削篇幅，甚至任意改写者亦时常有之。鲁迅兄弟对林译小说既喜好，也颇有微词，他们倡导一种信的翻译态度，无疑是对林译在草创时期这种意译随意性的反拨。再次，周氏兄弟曾随同章太炎研习小学，文字功底扎实，因而“《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虽然译者自谦“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但其在语言上的锤炼推敲，即使在当时的古文家看来也是几乎无可挑剔的。

1917年，陈独秀与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起文学革命运动，两人几乎不约而同地以西方文学作为发起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依据和建设新文学的蓝本。由于发起和参与文学革命运动的同仁们大都有着留学国外的背景，他们对西方文学有深入的了解，同时又有良好的语言基础，因而文学革命运动兴起后的一个突出的文学现象就是外国文学翻译的鼎盛。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将译介世界文学作为研究会成员的一项主要工作。茅盾在接编《小说月报》时发表了一个《改革宣言》，明确指出：“小说月报行世以来，已有11年矣，今当第12年之始，某更新而扩充之，将于译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思潮之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进之方法。同人认为西洋文学变迁之过程有急需介绍与国人之必要。”“同人认为研究哲理介绍文学流派虽为刻不容缓之事，而移译西欧名著使读者得见某派面目之一斑，不起空中楼阁之憾，尤为重要。”文学研究会之后又有沉钟社、未名社等社团也都以翻译外国文学为己任。虽然当时作为异军突起的创造社曾经不满各个文学社团过于注重翻译外国文学，发起了一场“媒婆与处女”之争，认为翻译工作只是起到了媒婆的作用，新文学更加需要的是新作品的创造。但是，即使如此，创造社的几位骨干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仍然做出了显著的贡献。毫无疑问，相对于中国文学史上形形色色的文学运动而言，五四新文学运动之新就在于它是一场由西方进步文学思潮所引发同时又以西方进步文学思潮为理论参照的文学运动。对西方文学的了解与译介，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里在时空范围里形成了全方位接触的局面，在数量和质量上掀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高潮。仅以文学研究会的翻译工作而论，《小说月报》从1921—1926年的六年间，就发表译作数十种，其中俄国文学32种、法国文学27种、日本文学13种、英国文学8种、印度文学6种。同时，还先后刊出了一些专号，集中介绍某个国家的文学；开辟的“海外文坛消息”专栏，发表了两百多则消息，向国人介绍外国文学思潮和文学活动的最新消息，从而将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在时空距离上拉到了同一个层次上。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新文学进入发展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无论在规模还是在质量上都有了更大的进步。在这一时期，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新文学草创期的主将们仍然在继续自己的翻译工作，而如巴金、李青崖、卞之琳、戈宝权、李健吾、梁宗岱等新一代的翻译家也正在成长起来。这一时期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第一，由于左翼文学运动的日益壮大，文学翻译工作的时代焦点聚集到了苏俄文学方面。对俄国文学的译介其实在20年代就很受新文学家们的重视，到了30年代，翻译的重点转移到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尤其是以高尔基、法捷涅夫



等为代表的苏联革命作家。这一新兴文学的翻译工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注入了一种新的强劲的力量，并且影响了此后将近五十年的中国文学的主题、形式、艺术风格乃至话语方式的构成与面貌。第二，如果说在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里，翻译工作主要集中在文学作品上，对文学理论与思潮则主要是采取撰文介绍的方式，那么30年代对文学理论原著的翻译开始得到了译者们的重视。左翼作家联盟曾经组织左翼作家翻译出版了三套文艺理论丛书，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文学的经典文献，而鲁迅也亲自翻译出版了普列汉诺夫和托洛斯基的理论著作，就如鲁迅自己所言，翻译这些著作是为了学习，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同时也是为了促使大家更加深入地了解 and 领会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精神。所以，这些理论著作的出版意义非常重大，它们从形式上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第三，文学的翻译工作进入了自觉与成熟的阶段。其标志就是《世界文库》的组织出版。1935年5月，郑振铎在上海生活书店创刊了《世界文库》。在《世界文库发刊缘起》中，郑振铎将有计划地介绍和整理视为文库的创办宗旨。《世界文库》第一册在1935年的5月20日出版，一年内如期出版了12册，译介外国文学名著共61种，而其译者几乎网罗了当时新文学界老中青年中所有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这一翻译界的盛举，后来因战争的降临而没有继续下去，但其意义却是很深远的。这不仅表现在它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地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集体活动，利用整个文学界的优势资源，克服了新文学草创期翻译工作中常见的重其所轻、轻其所重的弊端，而且表现在组织者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理念：“我自己（并希望同人）要借此机会重新来实验，究竟外国名著是否能够翻成真正‘文学的’译本，即从读者的兴味上及持久性上说，究竟能否在本国的名著里占有一个优越的或至少平等的地位。”^①翻译其实是一种双语的活动，译者不仅要精准地通晓所译作品的语言，而且也要熟练地掌握自己的母语，尤其是文学翻译，译者本身的文学语言的运用能力以及对作品中表达的生活的理解能力，都是文学作品翻译不可缺少的条件。翻译不仅仅是对称性地将一国的语言翻成本国的语言，优秀的翻译往往还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所以，编辑者所提出的“文学的”译本，无疑就是对文学翻译的文学性和创造性的要求，这种理念的形成说明中国现代文学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已经真正走向了成熟。

第二节 现代中外文学交流实践的基本特征

正如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中国现代社会的嬗变转型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样，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史也不能不深受中国现代社会现实和中国文学自身的本土传统的影响。这种影响渗透到了对外国文学的翻译、理解、选择等一系列的关系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在接受外国文学方面或者说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史上一些基本的特点。

一是实践性。在清末民初，向西方学习的重点主题是科技和政制，严复等人就是在

^① 郑振铎：《世界文库·影印出版前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一种富国强民的焦虑中从事翻译工作的，无论《天演论》还是《群学肄言》的翻译，都明确地显示出一种实践性意图，都是为了尽快地将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和民主法制的观念引入中国，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而文学的重要性尚未真正显示出来，所以那个时代对于外国文学的翻译多少带有一种随意性。譬如译界泰斗林纾，当初开始外国小说的翻译只是因为译书可以暂时缓解自己的丧偶之痛。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生改变了这种状况，也可以说正是新文学运动发起者们对西方19世纪进步文艺思潮的推介引发了五四新文学运动。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开篇就从西方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推论出中国社会如要变革，国民精神必须变革，而要国民精神变革，文学革命就势在必行。于是陈独秀张扬起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其中要建设的国民文学、社会文学、写实文学的概念都是从西方文学中借鉴而来的。胡适提倡文学改良显然受到当时在英美流行的意象主义诗人庞德的启发，他后来进一步为自己重视文字语言的改革作辩护时所采取的论据也是西方语言文字变革带来的文学变革的历史经验。胡适译作不多，但在五四时期他同罗家伦合译过易卜生的《娜拉》，同时他也写了文章《易卜生主义》专门介绍了易卜生的个性解放思想，其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陈独秀等人最初提倡文学革命的基本理论及周作人、李大钊等人关于新文学发展的建设性意见，都直接或间接地运用了外国文学的理论与外国文学的经验。

二是选择性。晚清维新派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往往是零碎的、随意的，自五四新文学革命后，这种现象有了很大改观。在五四文学革命以后短短几年内，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各样的文学思潮如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精神分析、表现主义等都被比较系统、完整地介绍进来。但是我们要看到，在一个民族发生大动荡、大变革的时候，这个民族向另一个民族寻求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料，与其说是一种翻译活动，不如说是一种战斗的需要。所以，虽然新文学家的翻译较之过去更有系统，更加具有计划性，但在翻译介绍时他们往往把目光主要集中在那些与自己民族所处环境、所遇问题相同或相似的国家。据《新青年》、《新潮》、《小说月报》三大杂志统计，当时翻译的小说共155篇，作家84人，其中英、美、法、德仅32篇，作家12人，其余大部分作家作品属于东南欧和北欧。因为这些国家与中国一样，或者处于西方列强的统治下，或者受着西方列强的欺凌，大都存在民族的独立与解放的问题。而在五四新文学革命发展时期，俄国进步文学的介绍与研究尤其显得突出。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统计，1920—1927年间，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单行本有190种，其中有69种是俄国文学作品。当时俄国文学的翻译除了单行本以外还有不少综合性的集子收有俄国文学作品，而且还有更多的作品散布在各种文学期刊上，其状况可谓极一时之盛。1921年，《小说月报》12卷号外还出版了一个“俄国文学研究专号”，译出了包括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蒲宁、安德列耶夫、高尔基在内的25位俄国著名作家的作品。应该说，当时对于“俄罗斯文学的爱好，在一般知识分子中间，成为一种风气；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革命的知识分子中间，成为一种运动”^①。这主要是因为许多

① 茅盾：《果戈理在中国》，《文艺报》1952年第4期。



新文学作家从俄国文学中看到被压迫者的善良的靈魂，被压迫者的酸辛和掙扎，“明白世上有两种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而且从最初的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文学中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到了2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新文学作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学论著和国际无产阶级文艺理论与作品逐渐得到翻译介绍，对许多新文学作家的世界观实现由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对30年代左翼文学的兴起都有重大影响。

三是前沿性。五四新文学运动发生的理论背景无疑是比较复杂的，就西方资源而言，有19世纪以来的写实主义思潮的影响，也有更早时期的以歌德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思潮的启示，18世纪启蒙主义的理性精神与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本主义思潮更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两大精神支柱。这些资源都是西方文学的优秀传统，五四新文学对于西方文学的优秀传统的移植与借鉴无疑是新文学作家们最为关注的事情，但尤其可贵的是新文学作家对于西方最新流行的各种思潮同样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在20年代初期，西方表现主义的思潮几乎是同步地得到了新文学作家的介绍，1915年陈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中就已经提到梅特林克，称梅特林克是与托尔斯泰、左拉、易卜生并列的世界近代四大代表作家，1920年《新潮》杂志第2卷第3期刊登了赵承易翻译的梅特林克的作品《白黎悠和梅立桑》（即《普莱雅斯和梅丽桑德》），1920年《少年中国》第1卷第10期发表易家钺的文章《诗人梅德林》，对梅特林克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而且指出了梅特林克是“神秘主义的巨子，象征主义的先锋”，他别开生面的作品不仅是对于旧剧形式的破坏，而且是在于他的主题表达“暗示不实现于外界的超越的神秘世界”。1923年9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了王维克翻译的梅特林克的《青鸟》，几乎同时上海商务印书馆也分别推出了傅东华译的《青鸟》和汤澄波译的《梅脱灵戏曲集》。艾略特是西方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20世纪20年代他的《荒原》一诗以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现状的象征性揭示，宣告了西方文学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中国现代诗人中有叶公超、王辛笛等曾经受业于艾略特，中国现代诗坛对艾略特的介绍也是从3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了。1934年4月，《清华学报》第9卷第2期发表了叶公超的《爱略特的诗》，评述了两部研究艾略特的著作和艾略特本人的诗论。1937年，赵萝蕤翻译的《荒原》由新诗出版社出版，叶公超为此译本写了序言，再一次阐述了艾略特的诗学主张及其艾略特在当代诗坛的意义。后来西南联大的一群青年诗人在英籍教授燕卜逊的带领下，将艾略特的诗学主张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掀起了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又一次现代主义文学的高潮。现代中国作家对于西方当下文学思潮和状况的了解，不仅表现在对这些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潮与作家的关注，而且也表现在他们对一些具有特色的文学现象或者思潮的敏感。譬如20世纪30年代后期，德国在希特勒的统治下，排犹问题越来越严重，许多德国犹太民族的知识分子纷纷流亡国外，于是有了所谓“德语流亡文学”。对这种二战前后出现的西方文学现象，中国文学界也给予了及时的介绍。1936年，郑伯奇发表了《德国的新移民文学》一文，对这一文学现象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也表达了中国现代文学界对那些进步的反法西斯的德语作家的境遇的同情与关注。到40年代，这些“德语流亡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作品陆续地被翻译过来，如布莱希特的《第三帝国的恐怖与灾难》、《奸细》、



《两个面包师》，康多洛维之（Alfred Kontorowicz）的《到西线去》，赛该尔斯（Anna Seghers）的《第七个十字架》，洛克尔（Rudolf Rocker）的《萌芽》，等等。对“德语流亡文学”现象的关注，当然与二战反法西斯的国际主义精神息息相关，也是中国文学界在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与备受民族歧视的德语流亡作家的一种心灵的呼应，同时也确实能够体现中国现代文学在一些重要的精神层面上与西方文学的接轨。

第三节 外国文学参照下的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在中国，外国文学的大量译介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在这以前，尽管西方的科学技术已经陆续地被引进国内，但中国文化仍然处于一种大一统的状态中，中国的士大夫们仍然沉睡在精神文明大国的美梦里，西方有物质文明，中国有精神文明，依然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甚至包括那些本来很有见识的知识分子们重要的精神支柱。所以，五四新文学运动对外国文学的大量译介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这一举动彻底打破了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的专制主义与封闭局面，开阔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和胸怀，促进了现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无论思想内容还是形式风格，都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学历史的国度，在几千年的文学历史中，流派纷呈，争奇斗艳。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封闭自守性质，由于中国政制的封建性，中国社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历史轨迹经常体现为一种周期震荡式的发展。文学的发展也是如此，由盛而衰，几乎是每一种文学运动和文学流派不可避免的命运。所以，中国文学史上也不乏推陈出新的文学革命运动。不过，中国古代的文学革命运动往往是在自身传统内部的反动，无论是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化大革命，还是前后七子的革新运动，或者其宗旨在于以复古而立新宗，或者就是借助于中国文学传统中的非主流因素来反传统。这些都说明中国古代文学的演进与变迁乃是中国文学传统自身的调整，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能够保持如此强大、封闭、自守的大一统状态的原因。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大量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为中国文学传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完整的参照体系，这种参照对比是十分鲜明的。在价值观上，西方的文学是宗教性的，中国的传统文学是世俗性的；在文学观上，西方的文学是为人生的，是为社会的，而中国的文学观念则是摇摆在两极：要么是经国之大业，为皇上，为君权，要么就是消遣的、娱乐的；在主题上，西方文学尤其是西方近代文学多写人的命运，多写国民生活，进行社会分析，探究生存问题，而中国传统文学的主题则多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鬼怪神妖的故事；在艺术风格上，西方文学重视悲剧和净化，重视将有价值的事物撕毁给人看，喜欢展现人的生命的有价值、有尊严的毁灭，而中国传统文学重视喜剧与圆满，重视正义的伦理力量的胜利与文学的教化意义，即使如《红楼梦》这样的千古难遇的悲剧作品，最后还是迫于社会传统的力量在结尾之处平添了一个兰桂齐芳的中兴结局。五四运动是一次爱国运动，也是近代以来一次最为激进的要求改革的运动，推进思想革命、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几乎成



了这个时代所有改革者的一项共识。在这种情形下，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对比的鲜明性突出地展示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弊端，也展示了中国新文学建设今后努力的方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比的整体性也使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开创者这一代人对中国文学传统如何转化成现代思想资源方面基本上抱持一种绝望的态度，胡适整理国故是要到国故中去“打鬼”，而鲁迅在时时提醒自己要清除韩非子、庄周的“鬼气”与“毒气”，并且清醒地认识到要清除还不容易。可见，中国现代作家在对待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上多采取激烈的、整体性否定的策略，这首先得归功于西方文学的大量输入为中国作家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参照体系，为中国作家锤炼了一种整体性的眼光。

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中国新文学的建设就已经突破了闭关自守的局限，开始在一一种与世界文学广泛联系的文化语境中发展和壮大自己。毫无疑问，每一个民族的文学发展都会产生自己的主题，面对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形成自我发展壮大的规律和特点。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当然也不例外，民族救亡和思想启蒙是这个时代最为突出的两大主题，中国现代作家无论何种派别、何种渊源，几乎都在自觉地以自己的力量承载着这一时代里救国图强的社会主题。关于这一点，文学史家们已经用无数多的历史事实作出了无可争辩的说明。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处于与世界文学广泛联系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在其主题表现上也自然地呈现出比较繁复的面貌。首先要指出的是，在对社会、对现实的关注的同时，现代文学也表现出了对人自身内在精神的关注。从表现人的外在的事功、命运、品格、气质到挖掘人的内在心灵深层的潜意识、无意识的存在与流动，这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深深影响西方文学的结果，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文学普遍向内转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新文学的建设一开始就遭遇到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鲁迅不仅在写小说时多“采用弗罗特说”，揭示人物潜在的欲望和下意识，而且他对日本文学理论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的推崇和喜爱，无疑也贯穿着他对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了解与信任。郭沫若同鲁迅一样也是学医出身，对精神分析学说有深入的了解和准确的运用，他在《叶罗提之墓》、《残春》等小说中对人物潜意识的发掘，本身就是小说所要表达的主题。再后施蛰存、徐讦、张爱玲等作家对精神分析学说的运用更是达到出神入化的水平，将现代文学中的人学理念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深度，与现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作品重视对人的国民性、阶级性以及道德伦理特征的揭示构成了一种相互的补充。

其次要指出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注重揭示人物形象的性格的真实性的同时，也较为注重人的存在的真实性的揭示。受到19世纪后期批判现实主义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突破了传统的白描手法的局限，开始注重人物肖像、性格的细致描写，真实性是中国新文学所追求的第一美学标准。这种真实性无疑是建立在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是19世纪机械文明对于精确性的追求在文学上的反映。但是，机械文明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福祉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异化的焦虑。当人无法控制自己的创造物，当机械文明的高度发展已经消解了时空在人们观念中的恒定感，人的生存的真实性问题也就成了当代人焦虑的精神源泉。人的生存的细节真实和表象真实往往成了人的存在的本质真实的遮蔽，在这样一种精神背景下，存在主义思潮崛起于西方并且很



快就得到了中国作家的呼应。钱钟书的《围城》以现代知识分子为题材，通过对方鸿渐的性格及其遭遇的描写，展示了陷于各种围城中的人想冲出去而关在围城外的人又想挤进来的荒谬局面，首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揭示出了人是一股徒劳的激情的主题。而冯至的诗集《十四行》、小说《伍子胥》则在存在主义大师里尔克和克尔凯戈尔的影响下，突出了诗与生命经验的联系，展示了在一个文化荒歉的时代里个体生命的选择与担当的主题。不仅主题表现是如此，艺术形式如西方文学中的意识流、蒙太奇、意象诗等也是几乎在同样的时代里被介绍给中国的文学家。这些主题和形式的出现都清晰地说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虽然是在西方优秀的文学传统影响下得以实现的，但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对西方最前卫的文学思潮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并及时地予以介绍、借鉴，从而与西方文学在发展轨迹上较多地保持着同步性。

第四节 本教程的目的、体例与编写

外国文学被大量介绍进来，不仅给中国的文学家和学者带来了一个比较的参照体系，让中国的文学家和学者确立起了一种比较的眼光，而且也现代学术在建立比较文学学科方面奠定了基础。因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需要具备足够的外国文学的资源作为支撑，而且中国现代文学对西方文学的翻译介绍和借鉴运用的特点也决定或者说制约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自身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通常人们认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基本宗旨是在各民族文学的发展历史之间追本溯源，寻求共同的规律。尤其是近十几年来，在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刺激下，中国的一些新进学者接受了赛伊德的新东方主义的观点和思路，认为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其本质是欧洲中心的，影响研究将欧洲文学看成是其他民族文学的发源地，体现着的是欧洲根深蒂固的文化霸权主义。这种观念在提升民族文学的地位、警惕民族文学话语的沦落方面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因此就清除影响研究在比较文学领域中的主导地位，显然是违背历史主义精神的。比较文学不能离开文学历史状况，离开了文学史的比较文学只可能是一推即倒的空中楼阁。从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我们虽然也能找到许多的理由来证实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传统之间的那道深远而巨大的壕沟。没有中国深厚的文学传统，就没有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根基，同样，没有这道壕沟，也就不会有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这道壕沟得以挖掘成功，毫无疑问有赖于西方文学的助力。正是西方文学的大量的译介，促使中国文学在思维方式、主题表达、观念形态和艺术风格等各个方面都形成了崭新的面貌。正如当年鲁迅所说，他之所以写起小说来完全是因为他看了几十篇外国小说的缘故，很多的现代作家都是从外国文学的阅读中受到启示和鼓舞才开始文学创作的。所以，虽然我们反对中国新文学就是西方文学在中国土壤上的移植的说法，但是，从思想资源和艺术资源两方面来看，中国现代文学主要是在西方文学尤其是 19 世纪以



来的进步文学的影响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意识本质、艺术形式和发展轨迹都只能到西方文学中去寻找它的渊源。

正是坚守这种历史主义的立场，本教程在思路和体例上基本上采用了影响研究的方法和原则。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本书的立意所在。此前有1992年出版的范伯群、朱栋霖先生主编的《1898—1949年中外文学比较史》也是立意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部著作的特点是以时间为线索，分段、分类介绍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在分段上沿袭了中国文学史上通用的近代、现代概念，在分类上则主要以思潮和文学体裁为线索。为了实现以比较文学的角度和理念来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同时又避免将中国现代文学史讲成一部比较文学史，本教程采用的体例是以作家为线索，重点地、突出地展示和论述一些有代表性的外国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从遴选的时间上看，本教程突破了近代、现代和当代这种以社会革命史为依据的划分方法，采用了大现代的概念。所谓现代，包括从1898年戊戌维新到21世纪初期这一百余年的时间。从遴选的范围来看，入选作家有西方的，有俄国的，也有日本的；有现实主义的，有浪漫主义的，也有现代主义的；有小说家，有诗人，有戏剧家，也有文学理论家。从所遴选作家的文学成就来看，这些外国作家都是具有巨大的原创性的文化伟人，都在某些方面做出过引导历史潮流的贡献，从他们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理论与创作资源。在考察这种关系时，本教程则注重突出外国作家对中国文学的有力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作家的文学观念上，而且或者说更主要的是表现在他们创作的作品中。对于作家具体文本的分析是本书自始至终坚持的原则，不仅从思想观念上，从文化传播上，而且从经典作家的经典文本的分析中来把握、解析这种影响，来分析和定位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与世界性程度，并进一步以中国作家的现代性与世界性为标尺，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进行重新认识与评价，突出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和互动的主题，体现出吸取人类先进文化以促进本民族文化健康发展的理念。



第一章 易卜生与中国现代文学

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挪威戏剧家，是欧洲 19 世纪末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欧洲近代戏剧的奠基人。他一生共创作了 26 个剧本，以及大量的诗歌、文艺论文、书信。他的戏剧创作，以严峻的真实、深邃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在现代戏剧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他被称为“现代戏剧之父”。他一生写了许多以中、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塑造了众多要求自由的人物形象，并从道德观念的角度去解释社会问题。他的一系列针对性强、富有特色的社会问题剧，从各个角度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表达了资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的民主思想和社会理想。他创作的剧本有《野鸭》（1884）、《社会支柱》（1877）、《玩偶之家》（1879）、《群鬼》（1881）、《人民公敌》（1882）、《罗斯莫庄》（1886）、《海上夫人》（1888）、《海达·高布乐》（1890），以《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最有代表性。

易卜生历经了半个世纪的戏剧生涯，跨越了三个不同的时期，每个时期都以不同的方式对后世产生影响。他早期那些富有诗意的史诗剧，预示了先锋派戏剧运动的到来；他后期那些越来越带有隐喻性质的作品，则预告了一种全新戏剧的产生。在这类剧作中，代现实主义而起的是更丰富的象征色彩。而使他赢得世界声誉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是他中期的现实主义的社会问题剧。19 世纪 80 年代，欧洲戏剧正处于衰落时期，戏剧界的颓废落后现象十分严重，舞台被一些形式主义、内容空洞、缺乏生活真实、矫揉造作、陈腐反动的东西充斥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易卜生创作了他的社会问题剧。他摒弃了当时欧洲舞台上流行的乔装、谋杀、格斗等惊险场面和奇遇、意外的情节，以及宣扬封建意识、迎合宫廷情趣的王室秘闻、王公小姐的风流艳史，而以严峻的真实、深邃的思想作为自己戏剧创作的最重要的原则。他善于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揭露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伪善和市侩哲学，始终以社会现实中的尖锐问题作为戏剧冲突的中心，把观众当作剧中的人物，把观众自己的事当作剧中的情节，而且情节的发展也是沿着生活本身的轨迹进行的，所以剧中的一切才显得那么真实、自然。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震撼了欧洲的戏剧舞台，引起了戏剧史上的一场重大革命，为欧洲戏剧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中国作家深受影响的也正是这些社会问题剧。